



中国历史上的唯物论哲学家

广西人民出版社

K825.1/1

中国历史上的唯物论哲学家

张祥生 林建初 马忠桂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的唯物论哲学家

张祥生 林建初 马忠桂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百色地区右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6.375印张 121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260册

书号：2113·9 定价：0.45元

前 言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古代人民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 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唯物主义哲学，产生出一批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编写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历史批判继承的方针，从一个侧面给读者提供一些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材料。

本书介绍了我国历史上十五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生平事迹和主要哲学观点。这些哲学家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史各个阶段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哲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光荣的斗争传统。他们尽管活动的年代不同，哲学观点有异，但对捍卫和发展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中有些人不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而且在世界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了解这

些哲学家的斗争业绩和哲学观点，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思想路线斗争的认识，这对于提高鉴别和批判唯心主义的能力，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书为集体编写。林建初同志撰写了《柳宗元》、《张载》、《王安石》、《陈亮》、《王廷相》；马忠桂同志撰写了《孙武》、《荀况》、《韩非》、《范缜》；张祥生同志撰写了《墨翟》、《司马迁》、《桓谭》、《王充》、《王夫之》、《戴震》等篇。

本书所介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只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代表人物，我国古代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远不只这些。限于水平，作者对这些人物的介绍是不够全面的，甚至可能还有不少错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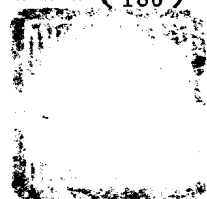
作 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孙 武.....	(1)
墨 翟.....	(14)
荀 况.....	(26)
韩 非.....	(42)
司马迁.....	(55)
桓 谭.....	(69)
王 充.....	(81)
范 缜.....	(95)
柳宗元.....	(108)
王安石.....	(121)
张 载.....	(133)
陈 亮.....	(145)
王廷相.....	(157)
王夫之.....	(169)
戴 震.....	(186)

D1374/53



孙 武

孙武是闻名中外的我国古代的大军事学家，出色地把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运用到军事和军事学方面，从《孙子兵法》一书可以看出，他又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是春秋末期唯物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

孙武字长卿，世称孙子，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惠民县）人，生卒年代不详，活动年代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到公元前五世纪初，约与孔子同时。他因齐国发生内乱，投奔到南方的吴国，经吴王阖闾的重臣伍子胥推荐，带着自己所著的兵法求见吴王。关于孙子见吴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阖闾看了孙子的兵法，接见了他，对他说：“先生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可以试一下带兵吗？”孙子说：“可以。”阖闾又问：“可以用妇女来试吗？”孙子回答：“可以。”于是经吴王许可，从王宫中拨出一百八十名美女。孙子把她们分为左右两队，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分别

担任左右队长，命令美女们拿着戟列队站着。孙子详细地对她们讲明了号令，规定了动作，然后下令把铁钺（古代的军威仪仗）排立起来，又三令五申，宣布军法。但是，号令发出后，宫女们不仅没有听从，还嬉嬉哈哈地大笑起来。孙子说：“规定不明确，号令不熟悉，是将帅的罪过。”又再次三令五申，发出号令，宫女们又报以一阵大笑。孙子说：

“号令已经清楚明白了，不执行号令就是领队‘吏士’的罪过！”要将左右队长斩首。这时吴王正在台上观看，一看孙子要斩他的两个爱妃，慌忙派人向孙子传令：“寡人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寡人没有这两个妃子，吃东西也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回报：“臣既已接受王的任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说罢，命令武士把两个队长当场斩首示众，又按队列的次序指定了两个新的队长。当孙子再传号令时，宫女们老实地按照号令，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下、起立，再也没有一个敢出声了。操练完毕，孙子派人向吴王报告：“女兵已经训练整齐，请大王下来检查，大王想怎样使用她们都可以，就是命令她们去赴汤蹈火也使得。”吴王说：“算啦，将军回馆舍休息去吧，寡人不愿下去看了。”阖闾从此了解孙子善于用兵，终于任用他为将军。

孙子在吴国期间，协同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治国治军，图强争霸。司马迁说：“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列

传》)孙子在吴国图强争霸的事业中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后来他辞去将军职务,去过隐居生活,不知所终。

孙子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流传到现在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国最古的兵书。这部兵书,战国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并为我国历代军事家所推崇,被奉为武经。七世纪传到日本,后来相继被译成法、英、德、俄等文本。直到现在,这部兵书在国内外仍然享有盛誉。这部书在我国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书中包含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对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二

孙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天命、鬼神的眼光上。春秋战国时期,围绕尊天命还是反天命的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也渗透到军事思想领域。那时候,在发动战争前,往往用求神问卜、观看天象等迷信做法去预卜胜负,然后决定打或不打。孙子坚决反对这种迷信天命鬼神的做法,他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孙子兵法·用间》,以下只注篇名)这就是说,不能用求神问卜、以相似的事件作类比去主观推测、以及用夜观星辰运行的度数等方法去预测战争的胜负。孙子在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时,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他看来,“天”不是天命

论者所说的那种有意志的、能主宰一切的东西，而是“阴阳、寒暑、时制”（《计》）这样一些自然现象。孙子认为，军队在战争中打败仗不是由于天意，他在《地形》篇中讲军队失败有“走”、“弛”、“陷”、“崩”、“乱”、“北”等六种情形，“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孙子在讲到深入敌国作战的时候，还特地指出要在部队中“禁祥去疑”（《九地》），即禁止各种迷信，以消除部属的疑惑，这样就能使部下“至死无所之”，大难临头也不会逃跑。从《孙子兵法》看出，他在尊天命和反天命的斗争中，是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与唯心主义的“天命”说相对立，孙子提出了以客观经验为基础的“先知”说。他认为祈求天命鬼神不能预卜战争的胜负，但人通过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客观情况的分析，可以作出预见。在他看来，战争的胜负不仅必须预见，而且也可以预见。《孙子兵法》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而有才干的君王将帅之所以能够提挈万众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在于他们能先于一般人洞悉战争的发展，预见战争的结局。他把这种通过对客观现象的分析而获得的预见称之为“先知”。他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

孙子还提出了使人达到“先知”的“五事”、七“计”。

所谓“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计》）“道”，是指要有清明的政治，使得民众与统治者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可以共生死，不怕危险。

“天”，是指要掌握昼夜、阴晴、风雨、炎热、寒冷、四季等气候条件的变化。“地”，是指要了解路途的远近，地形的险要或平坦，战场的广阔或狭窄，无退路的死地或有退路的生地等等地理条件。“将”，是指指挥作战的将军必须具备聪敏、诚信、仁慈、勇敢、威严等品质。“法”，是讲要整顿好军队的编制、军纪、军法以及军需供应等，为夺取战争胜利创造条件。孙子提出的这“五事”，即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天意为转移的。所谓七“计”是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计》）。就是说只要把敌我双方的情况，从这七个方面加以客观的比较，看哪一方强些，就能预知胜负。从“五事”、七“计”可以看出，孙子在分析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时，是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认识的基础的，他所遵循的是从客观到主观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孙子在总结古代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谋攻》）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论原则，这不仅在我国军事思想史上，而且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都是一个天才的创见。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创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仍是科学的真理。”（《论持久战》）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些评价中，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普遍的认识论意义，就是要求人们从客观情况出发全面地看问题，既掌握敌方的情况，又掌握我方的情况，从敌我双方的情况中找出战争的规律，并正确地运用这些规律指导自己的作战行动，从而把战胜敌人的主观愿望变为客观现实。由此可见，孙子的认识论，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带有朴素的辩证的性质。

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孙子十分强调在战争中要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决定攻、守、进、退，绝不能超越客观可能企求战争的胜利。他主张“先胜而后求战”，反对“先战而后求胜”（《形》），就是说，要先造成取胜的条件，然后才同敌人开战，而不能不顾条件先同敌人开战，希望在战争中侥幸取胜。他还告诫君主和将帅对待战争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感情用事，而必须根据客观实际的利弊决定自己的行动，“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为了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孙子十分重视“相敌”，即对敌情的观察判断。他在《行军》篇中，叙述了透过现象

（假象）观察真实敌情（本质）的方法，还列举了三十二种判断敌人动向和企图的事例。此外，《孙子兵法》提出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力量相当）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这一系列战术原则，都无不以“知彼知己”为前提。总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贯串《孙子兵法》全书，就足以表明孙子的整个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

当然，《孙子兵法》中也存在某些唯心主义的观点。例如它过分地强调和夸大了将帅的作用，说什么“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在孙子看来，国家的强弱安危似乎完全决定于将帅们个人的才能。他把某些所谓“上智”人物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认为有了伊挚（伊尹）和吕牙（姜子牙）这两位“上智”人物，殷朝和周朝才得以兴起（见《用间》）。这些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孙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不相信人民群众，因而竭力提倡愚兵政策。他要将帅具备“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的本领。对于士卒要“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九地》）他把士卒比做无知的羊群，要求将军带兵应当象驱赶羊群一样，“驱而往，驱而来”（《九地》）这种愚兵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严重的阶级对立。

三

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一书中，阐述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第一，《孙子兵法》包含有全面看问题的思想。

孙子从战争不是孤立的现象中看到事物的联系，因而，他特别强调要全面地认识与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自然等各种条件。在《计》篇中，他讲到了战争和“道”的关系，把政治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作战》篇中，他又论述了战争和人力、物力、财力的关系，指出“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大部队长期在外作战，会使国家财政经济发生危机，诸侯国就会“乘其弊而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的可怕后果。为了补充战争中的消耗，孙子还提出了“胜敌而益强”的具体办法，如“因粮于敌”，就地解决部队的给养，优待俘虏，厚赏有功的士卒，通过战胜敌人夺取装备、兵员补充自己，以战养战，使自己愈战愈强。《孙子兵法》对于战争本身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也体现了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曾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孙子提出，看待战争要兼顾利和害两个方面。他说：“智者之虑，

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九变》）他反复强调，将帅考虑问题要全面，不能只见利而不见害，也不能只见害而不见利。可以说，《孙子兵法》中的所有军事原则，都是经过“杂于利害”的思考而得出来的。

第二，《孙子兵法》中包含着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

孙子看到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他说：“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水之形，避高而趋下。”（《虚实》）这就是说，构成自然界的物质本原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没有哪一“行”处于永恒不变的地位；春、夏、秋、冬这“四时”依次更替，没有哪一个季节是固定不变的；日、月都有它各自的变化。水也是从高处不断向低处流动。

孙子指出，战争也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从变化发展的观点出发，他提出了“兵因敌而致胜”（《虚实》）的战术总原则，要求指挥员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随时根据不断变化的敌情，决定作战方式，采取相应措施，去夺取胜利。例如战场上作战双方的兵力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战术：兵力处于绝对优势，则采用围歼战术；兵力处于相对优势，可以打进攻战；兵力处于相对劣势，可用防守战术；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就应当退却，不能硬拚（见《形》、《谋攻》诸篇）。遇到各种不同

的战场和不同的地形，也要采用不同的战术：遇到双方谁得到谁就处于有利地位的“争地”，就要抢先派兵占领，不要等到敌人占领后再去进攻；遇到关隘，必须前出占领隘口，采取守的战术，等待敌人来攻；等等（见《地形》、《九地》诸篇）。

《孙子兵法》不仅要求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而且还要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工地造成敌情的变化，使战争向着有利于自己而不利敌人的方向发展，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它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的军事原则，要求指挥员必须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始终把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致人），而不应让敌人牵着鼻子走（不致于人）。孙子根据古代战争的经验，提出了许多“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方法。他提出用“示形”、

“动敌”等办法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按我方的意图行动。所谓“示形”，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等等。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谓“动敌”就是调动敌人。“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善于调动敌人的人，用佯动去迷惑敌人，使敌人必然尾随自己走；故意给敌人某种甜头，使敌人必然来取；用利益去引诱调动敌人，而埋伏重兵等待它。

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不要被敌人调动，“佯北勿从”，“饵兵勿食”（《军争》），对假装战败而退却逃跑的敌人不要跟踪追击，对用作诱饵的敌军小部队不要去吃，以防落进圈套而陷于被动危险的境地。在《九变》篇中，他讲到了一些根据敌方将帅的弱点造成敌情变化的方法：如果敌方的将帅有必死的决心，就可以诱其发展到盲目拚命而伺机消灭之（“必死，可杀也”）；其将帅贪生怕死，则可以诱其投降（“必生，可擒也”）；其将帅暴躁易怒，可加以侮辱，使其因激怒而轻举妄动（“忿速，可侮也”）；等等。此外，利用间谍也是造成敌情变化的重要方法。利用“死间”（将被敌人杀害的我方间谍）和“反间”（被我暗中收买的敌方间谍）向敌方提供假情报，可造成敌人的错误行动；收买敌方官吏作“内间”，在敌人内部进行挑拨离间等各种破坏活动，可使敌人内部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见《用间》）。

第三，《孙子兵法》包含有对立统一的朴素思想。

孙子看到了军事领域中许多对立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矛盾范畴，如敌与我，主与客，众与寡，攻与守，进与退，胜与败，等等。军队管理方面有爱与严、赏与罚、治与乱，部队状态方面有强与弱、勇与怯、劳与逸、饱与饥，兵力部署方面有分与合、虚与实，作战方式有奇与正，作战时间有久与速，行军路线有迂与直、远与近。孙子朴素地认识到这些矛盾的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实必有虚，有众必有寡，“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